

在冰雪中发起“元旦攻势”

□ 朱晓晖 孙 彤

1950年12月31日,“三八线”附近,凛冽寒风卷起漫天飞雪,气温低至零下25摄氏度。17时,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在短促的炮火准备之后,向“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在“三八线”的防御阵地发起进攻。

战役发起前,志愿军从上到下进行了缜密的战前侦察。第39军第116师派出侦察人员连续3天趴在临津江北岸前沿阵地仔细观察,终于发现了南岸峭壁上多条宽窄不一、利于突防的裂沟。随后,师组织各团进一步观察研究,确定了突击连可以利用的4条攀爬通道。

为避开敌空中火力打击,总攻一周前,志愿军连续校对日落时间和敌机飞离我阵地上空的时间。最后测定日落时间为17时03分,敌机飞离时间为16时40分,这中间的23分钟成为最佳炮火准备窗口。为保证成功突防,志愿军利用江北岸自然沟构筑出发阵地。攻击发起前,全师7500余人、70余门火炮、500匹骡马均严密隐藏,在距敌阵地最近不到150米处潜伏了18个小时。12月31日当天,美第8集团军司令官李奇微乘飞机进行低空巡视,也未发现我军即将发动攻势的迹象。16时40分,志愿军的炮火准备开始了,北岸飞起一串耀眼的信号弹。数千勇士从潜伏阵地中一跃而起,冒着南岸射来的弹雨,跨过刺骨的冰河,兵锋直指北纬38度线。

志愿军的炮火和冲锋号在傍晚响起后,李奇微如梦方醒:“真没想到,中国军人在这片毫无生机的荒原上发起了元旦攻势。”而这时,他的前沿防线早被打得千疮百孔。

志愿军右纵队第40、第50、第39、第38军各担任突破任务的指战员,在高浪浦里至永平地段上,冒着敌炮火封锁,向临津江和汉滩川南岸攻进。

临津江和汉滩川南岸是天然峭壁,南朝鲜第1、第6师凭险据守,敌防线前沿布满铁丝网和地雷。志愿军右纵队过江后,一举突破敌防御前沿,继续向敌防御纵深发展进攻。志愿军左纵队第42、第66军在永平至马坪里地段上突破南朝鲜军阵地。这一地段敌防御正面狭小,纵深内山川交错,白雪皑皑,两侧依托临津江和北汉江,南朝鲜第2、第5师在这一地段



志愿军部队向汉江南岸进发

纵深布防。

志愿军第39军第116师副师长张锋向突击部队下达了冲锋命令。战士们跳出交通壕,在炮弹爆炸的火光中踏冰向对岸进攻。突然,江南沙滩上腾起一片火光和烟柱,左翼连冲击地段上地雷爆炸了。在一连串爆炸后,志愿军战士冲到对岸悬崖边,架起云梯。紧接着,敌阵地上响起一片手榴弹爆炸声,三颗红色信号弹随即升上天空。

第39军在新堡、土井地段突过临津江后,迅速从南朝鲜第1师防御正面突入。经过一夜激战,于1951年1月1日拂晓前突入敌防御纵深约10公里,占领了大村、武建里地区,并有力地策应了第50军渡江。

为了阻止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的进攻,美第5航空队倾巢出动,对沿开城到汉城和沿涟川到汉城公路向南进的志愿军进行了猛烈攻击。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不顾美军飞机的狂轰滥炸,继续发展进攻,“联合国军”在“三八线”既设阵地的防御彻底崩溃,中国人民志愿军6个军和朝鲜人民军3个军团,乘胜继续向纵深发展进攻。鉴于此情况,李奇微于1月3日晨下令,全线撤至汉城以南组织防御。“联合国军”凭借其摩托化和机械化装备,在其空军掩护下迅速南逃。

在第三次战役发起前,彭德怀致

电志愿军左右两个纵队领导的电报中,就对战役发起后“联合国军”动态进行了分析,认为在南朝鲜军遭到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的严厉打击下,美军有放弃汉城,退守汉江南岸或在汉城以北固守清平里、议政府、高阳线之两种可能。

1月2日,志愿军副司令员韩先楚令右纵队第38、第39军各以1个师抓住议政府之敌;第38军主力前进至议政府以南,阻击议政府之敌南逃和从南向议政府增援之敌;第39军主力从西北及西南、第40军从北向议政府攻击;第50军迅速向议政府以西高阳前进,如高阳之敌南逃,则向汉城逼近。如议政府、高阳一线之敌撤退,则第50军向汉城追击,抢占汉江大桥,相机渡过汉江,其他各军向汉江攻进,并设法准备渡江,由朝鲜人民军第1军团担任汉城警戒。据此,志愿军各部于2日晚和3日上午继续向南挺进。

“联合国军”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的勇猛追击下,被迫于1月3日下午自汉城撤退。李奇微命令自下午3时起,汉城桥梁和来往主要道除军队之外,民间车辆和行人一律禁止通行。1月3日下午,美第8集团军从汉城撤退,步兵、卡车、坦克以及各种运载工具缓缓通过浮桥。美军在撤离的同时,用汽油、炸弹对汉城、仁川、金浦机场等进行了疯狂破坏。

1月4日下午,中国人民志愿军第39军第116师和朝鲜人民军第1军团占领汉城。志愿军第50军第149师于当晚进入汉城,第38军第114师、第39军第117师各有一部分侦察分队也于同日进入汉城。

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进入汉城后,严格遵守政策纪律,受到汉城市民的一致拥护。1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对占领汉城表示祝贺。社论同时指出:中国人民志愿军之所以在朝鲜能战胜“武装到牙齿”的美国侵略军,主要是因为他们是为正义人道而战,为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而战,为消灭美国侵略者而战,为使朝鲜和中国人民免于屠杀而战,为朝鲜和中国妇女儿童的安全而战。因而他们所到之地,救死扶伤,恢复城镇和乡村,恢复朝鲜人民的和平生活。他们的伟大行动,已受到朝鲜人民的热烈欢迎。

这时,彭德怀鉴于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在进攻中未能大量歼灭敌有生力量,“联合国军”似在有计划地撤退,企图利用其海空军优势,对志愿军进行南北夹击。而志愿军经过三次战役后,非常疲惫,急需休整补充。为避免前进过远而陷于不利境地,7日,彭德怀致电左右纵队指挥员韩先楚、吴瑞林及朝鲜人民军方虎山军团长:各军立即停止追击,结束战役,转入休整,准备春季攻势,并注意加强警戒和防空。

第三次战役胜利结束。“联合国军”全部撤至北纬37度线附近之平泽、安城、堤川、三陟一线及以南。在这次战役中,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克服艰难险阻,经过8昼夜的连续进攻,突破了“联合国军”在“三八线”的防御,占领了汉城,并将战线从“三八线”推进到37度线附近,毙伤俘敌1.9万余人,进一步扩大了中朝两国人民在国际上的影响。

(摘自2022年1月30日《解放军报》)



从淮海战役胜利看支前运动

“耕战互助”凝聚人民战争伟力

□ 王少亭 贾 萍

淮海战役是1948年11月至1949年1月间,人民解放军华东、中原野战军60余万人,在以徐州为中心,东起海州(今连云港)、西至商丘、北起临城(今枣庄市薛城)、南达淮河的广大地区,与国民党军80余万人展开的战略决战,历时65天,共歼国民党军55.5万人。淮海战役的胜利,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军的防御计划,使长江中下游以北广大地区获得解放,从根本上动摇了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统治,加速了人民解放战争的进程。

淮海战役前夕,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对人民支前和后勤工作极为重视,一再强调“对于人民,必须实行耕战互助的方针”。淮海战役期间,各级党政机关积极开展“耕战互助”运动,实行人力、物力合理负担,工具、牲畜合理顶工,支前工、生产工合理顶替,照顾好民工家属生产,禁止无偿派差,实行给价包运,累计动员民工543万人,向前线运送弹药1295万斤、粮食9.6亿斤,真正做到了要人有人、要粮有粮、要物有物,部队打到哪里,人民就支援到哪里,实现了支前、生产两手抓、两不误、两促进,为争取战役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劳务减征,出工与生产互不影响。淮海战役期间,劳务出工是人民支前的重要形式。各级党政机关坚持出工与生产并重,区分不同情形,采取出工与生产劳务相抵、特别工种人员劳务减免等方法,既保证充足的力

量支援前线,又保证足够的劳力不误生产。淮海战役总前委教育部队特别是后勤部门不要对支前工作要求过高,尽力帮助支前群众解决好家庭生活困难,并以实际行动节省物资,珍惜民力。规定“凡服务军工机关、公营工厂之人,或生活来源全靠做工者,其本人不担任常备民工。小学老师不担任常备民工”,确保后方军工生产、工厂运行和学校教育不受影响。实行“前后方工的价格相抵,解决支前与生产的具体矛盾”,提升了劳务出工计算、计酬方法的合理性、公平性。这些紧贴实际、实事求是的动员措施,减轻了人民群众的出工负担,人民群众不会因为支援前线,导致生产生活受到影响,受到普遍欢迎和积极拥护。

粮食减免,支前与生活互相照应。战争年代,粮食生产受到严重影响,粮食供应成为关系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淮海战役期间,最多时每天需要粮食250多万斤。对此,各级党政机关针对佃户、荣誉军人、非解放区、灾荒地区的实际,制定出台具有当地特色、符合地区实际的粮食征收减免政策,并在后方积极开展代耕代种等活动,为支前民工外出后的粮食生产提供必要支持,保证无劳动户家庭有粮食吃、不断粮,基本生活不受影响。山东地区就出台政策规定,“无劳动力之军、工、烈属、鳏、寡、孤、独、生活困难者,酌情减免其负担的20%至50%,特殊困难确无

负担能力者,报区政府批准可予全部免征。”“凡遭水、旱、虫、雹、风灾之土地,呈报本府批准后,视灾情轻重酌量减免其受灾部分负担。”减赋政策体现了“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的人民战争思想,增强了人民群众对支前工作的情感认同,赢得了人民群众对动员行动的理解支持。

计价定制,供应与收入互促并进。战役期间,各解放区把支前生产与个人收入挂钩,灵活采取给价包运制、包运提成制和供给提奖制等经济手段,对支前民工进行经济补偿,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激发人民支前积极性,提升支前保障质效。“所谓包运制就是动用民力车辆,完成按市价发给工资,不是义务动员,这对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支援战争都是有利的……必须努力贯彻。”有的地方做军鞋不再采取妇女慰劳及派军鞋办法,改用按件计工,产量越高收入越多、质量越好收入越高,大大提升了生产效率 and 军品质量。1948年6月陈毅、邓小平给中央军委的报告称:“过去慰劳鞋、派军鞋穿上几天就坏。现在定购鞋则经久耐用,群众不但不感到支差之苦,反而增加他们的谋生之道。”这种政策既支援了前线,又促进了生产,群众支前积极性空前高涨,保证了源源不断的前方供给。

优抚补偿,物质与精神互为支撑。解放区把支前群众纳入表彰奖励、抚恤优待范畴,制定了详细的优

抚政策,明确民工负伤、牺牲和复员后的待遇问题。比如,参战民工在完成任务中负伤的,在附近医院进行疗养、医药报销;牺牲的民工运往其原籍殓葬,并给予一定的抚恤补偿。豫西军区规定,牺牲的民工由各县政府发给棺材费小麦500斤,抚恤小麦500斤,家属享受烈属之政治待遇。同时,还对畜力、车辆损失做出补偿说明:参战畜力死亡的,除了卖掉皮肉外,另补助其能够买一头牲口的赔偿费。山东滨县还要地方领导进行慰问:“我县支前牺牲一人……除政府抚恤粮外,该同志出丧时有本区区长亲自到他家给该同志与给其家庭安慰。”这些措施,极大地提升了民工支前的积极性、自觉性和获得感、荣誉感。

从外部环境看,土改翻身后的人民群众认识到支前是自己的事业,迸发出空前的支前热情。而“耕战互助”方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顺应人民意愿,维护人民利益,进一步激发了人民群众千里远程、随军转战的斗志。

(摘自2022年2月10日《中国国防报》)



在江西省永新县芦溪乡南阜村的村口,三棵百年古樟树静静伫立,年少时的欧阳洛曾在这三棵樟树下学习和阅读进步书籍……

欧阳洛,曾用名毛春芳,1900年生,江西永新人。1922年考入南昌第一师范,经常阅读《向导》《红灯周刊》等进步书刊,积极参加由赵醒侬、方志敏等领导的反对江西军阀的斗争。1923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5年1月,受党组织派遣,欧阳洛到吉安从事党的工作,发展了10多名党员。同年9月,他来到永新开展革命工作,领导农民运动,壮大党的队伍。

1926年7月,中共永新支部成立,欧阳洛担任支部书记,先后发展了贺子珍、贺敏学等一批党员,并组织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军。北伐军进入永新后,他担任了新的政权机构——县行政委员会委员长和县农民协会委员长。欧阳洛领导广大农民打倒豪绅地主,进行减租减息斗争,同时开展移风易俗、改革社会陋习的教育,特别是雷厉风行地实行禁烟运动。在他的领导下,永新农民、工人、学生等各阶层各方面都被发动起来,工农运动进入空前高涨的时期。

1927年4月,中共永新临时县委成立,欧阳洛担任书记。“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国民党右派分子、土豪劣绅与土匪勾结,纠合反动武装攻打永新县城,逮捕了一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他一面组织同志紧急转移,一面联络宁冈、安福、莲花三县农民武装,于7月分三路进攻永新县城,赶走反动派,营救出被捕的党员和群众。

7月下旬,根据江西省委指示,欧阳洛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起义部队南下后,他历尽艰险抵达上海找到党组织,化名毛春芳,被派到沪东区领导开展工人运动,后任沪东区委书记。他深入工人群众中进行细致的宣传动员,发展党员和团员,组织罢工,维护工人权益。经过努力,沪东区的主要工厂都建立起党的组织,恢复了正常的工作。

1929年6月,欧阳洛调任沪西区委书记,他积极开展各种斗争,使沪西区的工作有了新的起色。1929年9月,党中央决定重组

宁死不屈的工农运动先锋 ——欧阳洛

□ 范 帆

湖北省委,欧阳洛担任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部长。

1930年2月,欧阳洛担任湖北省委书记兼组织部部长。4月5日,由于叛徒出卖被捕。在狱中他受尽各种酷刑,始终坚贞不屈。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欧阳洛大义凛然地回答:“大丈夫死就死,决不投降!”英勇就义时年仅30岁。

如今,在永新县革命烈士纪念馆的门口,矗立着欧阳洛烈士的铜像,馆内陈列着他的部分遗物 and 生平事迹介绍资料。每当清明节、烈士纪念日,当地中小学生都会在这里举行追思和纪念活动,向欧阳洛的铜像敬献花篮,缅怀这位为国捐躯的革命先烈。

“欧阳洛是一名有着坚定革命信仰的战士,他为了革命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这种精神将一直激励着后人不忘初心、砥砺前行。”永新县革命烈士纪念馆馆长贺新平说。

(摘自2018年6月27日《人民日报》)

刘邓大军的借据

□ 李 涛 胡遵远

安徽省金寨县革命博物馆里珍藏着几张已经泛黄的纸张,是70多年前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后,为了筹措军粮等物品给当地群众出具的借据。从模糊的字迹中仍可依稀辨认出当年所借物品,既有大米、稻谷,也有棉衣、鞋子等物资。这些经历战争烽火借据,折射了人民军队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光荣传统,见证了大别山人民轰轰烈烈的拥军支前运动,阐释了“人民军队爱人民,人民军队人民爱”的革命真谛。

1947年6月30日,遵照中共中央制定的“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在外线大量歼灭敌人”的战略方针,刘伯承、邓小平率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进军大别山。8月27日,刘邓大军胜利完成了千里挺进任务,随即在大别山地区实施战略展开。由于实行无后方作战,刘邓大军不仅面临着敌军重兵围困,而且时时受到饥饿、疲劳、疾病的困扰。位于鄂豫皖三省交界处的大别山区气候寒冷潮湿,部队常常在山野林莽中露宿,在雨水泥泞里行军,加之水土不服,疟疾流行,非战斗减员严重。邓小平在1948年4月25日的报告中称:“大别山的几个纵队是有削弱,减员约百分之十五。”

在如此残酷恶劣的环境下,刘邓大军能够坚持大别山斗争,并得以生存和发展,须臾也离不开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早在千里挺进大别山时,刘邓大军就“约法三章”:以枪打老百姓者,枪毙;掠夺民财者,枪毙;强奸妇女者,枪毙。来到大别山后,刘邓大军立即广泛开展群众工作,放手发动群众实行土地改革,建立民主政权;同时积极维护群众利益,强调越是困难的情况下,越要更加严格地执行群众纪律,规定凡是征集的物资都要照价付钱或出具借据。刘邓大军用实际行动赢得了民心,人民群众踊跃献粮捐款,参军参战,掀起拥军支前高潮。据不完全统计,仅金寨县铁冲乡高畈村就给驻双河一带的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二纵队教导团捐献大米7007斤、稻谷1512斤、木柴2490斤、棉衣16件、鞋子49双。

军队打胜仗,人民是靠山。刘邓大军紧紧依靠人民群众,获取了克服艰难险阻、夺得伟大胜利的力量源泉,粉碎了敌人对大别山的全面围攻,迅速地开辟了广大的新解放区,在中原站稳了脚跟。

(摘自2022年5月8日《光明日报》)